

藝文生命與身體政治

——清代婦女文學史研究趨勢與展望

胡 曉 真*

摘 要

本文聚焦於 17 世紀到 20 世紀初的婦女文學，綜觀並分析晚近十年此一領域的研究走向，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本文指出「重寫文學史」的概念是近二十年來所有婦女文學研究的背景，而女性作品與「經典性」之間的關係更是思考的核心。由此出發，本文首先概述清代以降對女性作品的蒐集與編纂工作，乃至於現代學界的婦女文學史寫作；繼而討論近期對「經典」觀念的反省。次之，本文舉出目前婦女文學研究的主要議題，包括文學活動、文學論爭、個別作者研究、以文類為主要的研究等，並特別指出近現代婦女文藝現象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最後，本文列舉若干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例如婦女文學與宗教、婦女文學與地域文化、婦女與出版活動、婦女與書寫以外的藝文活動，以及閨秀階級以外婦女的藝文活動等。同時，本文也寄望未來的婦女文學研究，在經過當代理論淬煉後，能夠回歸文學文本，重思美學價值。

關鍵詞：婦女文學、文學史、經典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筆者曾於1994年發表一篇學術討論的論文，回顧並觀察西方漢學界在中國婦女文學史這個領域中所展現的幾個主要方向（胡曉真，1994），倏忽距今已經十年。在那篇討論中，我提出「跨學科研究」、「明清女性文學研究」、「研究對象社會層面之擴大」，以及「政治議題浮現」四者，作為該領域的主要現象。對當時的臺灣文史學界而言，女性主義、性別研究、婦女文學或女性文學、以及改寫文學史等概念正是風起雲湧，因此這篇研究討論刊出後不無迴響。尤其「明清女性文學」這個範圍，既已累積了相當份量的研究成果，又有大量的文本與史料等待挖掘，因此一如預期，從20世紀九〇年代進入21世紀，儼然已是一門顯學。就我的觀察，較諸九〇年代當時，明清女性文學這個研究領域十年來確已又發展成一片天地。而不可諱言，就在形勢看來一片大好之際，此一研究領域的瓶頸危機也已浮現，而正面轉捩點卻尚未具體成形。因此，雖然回顧與展望這樣的舊題很難花樣新翻，卻是此其時也。不過，在明清女性文學的大架構下，我們仍必須分殊女性在明清兩代文學發展中的角色與表現。畢竟，依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的記載，清代婦女作家的人數及其作品數量都遠遠超出明代，所以女性文學由明入清，以及在有清一代的發展過程，值得獨立探討。基於以上的認知，本文將以廣義的清代（約指17世紀到20世紀初，亦即由晚明到民初）女性文學為焦點，觀察並分析相關研究的現況與展望。受限於筆者的語言能力，此處所談到的研究皆以中文或英文發表。同時必須指出的是，本文所謂「女性文學」確指女性作家所創作之文學，所以男性作品以及相關研究中雖有大量涉及女性形象、性別意識等議題的部分，但因不在本文處理範圍內，在此也必須略而不談。

一、重劃文學史版圖

美國的婦女史專家曼素恩（Susan Mann）曾明確指出，只要將女性的概念帶入傳統的歷史結構，則不但會改變結構，甚至可能毀滅結構本身（Susan Mann, 1997）。事實上，幾乎所有近二十年重要的婦女史（以及婦女文學史）研究都是由類似的信念出發的。17世紀以降的三百年既是

女性文學的興盛時期，自是研究者最易取材也最易發揮的場域，而且一開始便昂然以「改／重寫文學史」為志。這其中最「經典」的詮釋典範，當推女性文學的「經典性」問題。長期被排除在主流以外的女性文學是否有自身的經典意識與傳統？又是否可能（或應該）在主流的經典架構中爭勝？此一詮釋典範一方面似已成為定論，一方面又仍有思考空間，因此本文的討論也將由此入手。

（一）婦女史的翻案

要談女性文學的經典性，仍必須先討論女性文學現象的社會與文化背景。近十年來，與明清女性文學研究互動最大的便是婦女史對 17 世紀以降中國女性（尤其是江南女性）生活的檢討，或者更明確地說，是翻案，是「改寫歷史」。文學研究者努力挖掘並呈現女性作者活躍積極的文學工作，婦女史專家則努力翻轉中國女性受盡壓迫又無能為力的卑微形象，發現她們在特定時空下豐富多彩的生命型態。文學研究者固然必須借重婦女史研究的成果以支撐文本的分析，但反過來說，由於明清女性的積極性往往通過文藝活動而展現，因此婦女史研究者或者自行由文學現象取材，或者樂於在文學研究的成果中尋求證據，兩種領域因此形成一種共榮的生態。這種依存生態如果長期未經檢視與反省，也可能因為過多的彼此互證而從所見略同變成不具說服力的自說自話，這恐怕是日後的研究者必須特別留意的問題。

文學研究者思考 17 世紀（晚明到清初）以後女性與文學的關係，需要參考歷史學者對政治現實及社會風氣的變遷，以及思想典範及知識傳統之移轉軌跡的探討。我們可由晚近的研究成果歸納 17 世紀以降女性文學所共有的社會與環境因素。在這方面，許多歷史學者的成就為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然而最全面也最具代表性的當推美國漢學界高彥頤 (Dorothy Ko) 與曼素恩 (Susan Mann) 二位的專著，¹ 分別對 17 與

1 參見 Dorothy Ko, *Teachers of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以及 Susan Mann, *The Precious Records*。此二書皆已有中譯本，高著參見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曼著分別有大陸譯本與臺灣譯

18世紀女性文藝活動的社會背景做了詳細的研究。迄今為止，這兩部書仍是重新探索並詮釋明清時期性別問題必須參考的著作。由於曼素恩的書較為後出，故對高彥頤的成果也有所借鏡，以凸顯盛清時代相較於17世紀的特色。高彥頤研究17世紀江南的女性文化，立論新穎，尤其她對女性生活情境（包括纏足習俗）提出新解，認為女性不只是受害者，甚至可能將之轉化為審美對象或者自我意識的表達方式，一時震動學界，引發爭議，堪稱婦女史「翻案」的經典之作。其實，高彥頤的著作仍奠基於正統史學訓練，例如她也首先強調明清時期江南地區隨米、棉、絲等產業而發生的經濟蓬勃現象。婦女文學活動的興起與江南社會史有絕對的相關性，沒有江南地區的高度城市化與商業化，女性追求文藝的機會就大為降低。經濟活動蓬勃對文化最直接的影響就在於教育的普及，尤其在中上層以上的仕紳以及商人家庭，更多婦女開始接受文字教育，而社會風氣使得男性文人也接受進而鼓勵婦女識字能文。同時，對婦女教育的重視也反應在最實際的婚姻市場上，文藝修養已成為中上層女性婚前教育的重要層面，實際上等於嫁妝的一部份。其次，出版活動隨經濟發展而日益活躍，明代嘉靖、萬曆以後，書籍市場丕變，數量遽增而價格銳減，促使非傳統菁英讀者如中下層文人、商人，以及閨秀等都有機會擁有書籍，形成了新的「讀者大眾」(reading public) 消費群，這個變化更對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女性來說，一方面仕紳家庭的家刻盛行，為家族女性提供管道，使其詩詞等作品有機會經出版而流通甚至傳世，而女性也因此成為家族文化傳統與資財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商業化的坊刻則出現兩極化的方向，一是高度精緻化的書籍，供人鑑賞保存；一是大量刻印的通俗書籍，平易近人。出版女性作品選集在17世紀就是書市的熱門賣點，《名媛詩歸》、《古今女史》等都是著名的例子。甚至女性自己也進行類似的工作，如沈宜修的《伊人思》與王端淑的《名媛詩緯》。高彥頤所勾勒的17世紀社會文化，至今都是晚明女性文學的

本，先後是定宜庄、顏宜葳譯，《緞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楊雅婷譯，《蘭閣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2005）。

研究者進行詮釋經常倚賴的歷史脈絡。

曼素恩同樣重視 18 世紀江南的社會經濟，也特別指出婦女在當時的生產與消費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她的研究進一步突出滿清的國家政策、地方政府在性別議題上的宣導，以及學術典範轉移對女性價值觀與文藝傾向的影響。根據她的討論，這種種因素塑造了新的婦德與女性文藝標準，不但有意識地與晚明的女性文化區隔，更成為盛清統治的象徵，集其大成的便是完顏憚珠 (1771-1833) 編纂《國朝閩秀正始集》這一事件。曼素恩認為這個由女性主導的大規模編輯活動，可以代表盛清時期「閩秀文化」的核心價值。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女性讀者在詩詞之外甚至開始有機會閱讀戲曲小說，在無聲之中介入了公眾的文字世界。甚至女性創作的戲曲小說也開始獲得出版機會，使她們由文化的接受者與消費者晉身為文化的生產者。尤其重要的是，由於女性的「共同文本」逐漸形成，閩中人乃得以跨越社交的障礙，在心理的層面上與其他女性構成「想像的社群」，藉由文字發生溝通與交感。再者，受到晚明思潮與「情」論的影響，文人重視陰性美感以及真實情感的自然表達，因而使得外於科舉限制的女性作品特質也獲得新的評價。明清文人往往表彰女性不同甚至優於男性的性靈潛力，鼓勵婦女接受文藝教育，並且致力於蒐集、評選、出版女性的詩詞作品。男性文人在明清婦女文學的發展上於是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² 明清江南的「才女文化」便在以上的各種社會文化因素匯集之下形成，也就是說，識字能文的婦女此時於江南集體性出現，而且積極參與文化的生產與消費。同樣的，這個「閩秀文化」的描述也為清代女性文學的研究者展開了一幅畫布，可以在其上繼續渲染揮毫。

將高彥頤與曼素恩的研究連接起來，可看出由明入清，雖然統治政權經歷鉅變，但江南地區的文化發展仍持續不衰，女性的教育與文藝活動也並未因此受到壓抑。事實上，如果以「明末清初」這個概念來觀察，則 17 世紀在社會與文化上其實應視為一個整體，本不宜以朝代更迭的政

2 孫康宜在這方面早已多有論述，詳見下文。

治事件而一分爲二。然而，曼素恩的研究又清楚呈現盛清以後女性文學與17世紀的分殊之處。晚明風流旖旎的青樓名妓文化在入清之後趨向衰落，並在盛清時期正式爲閨秀文化所取代。在筆者看來，除了時代脈絡的描繪以外，高彥頤對女性文學研究者的主要貢獻在於證明另類或者反向思考的可行性，以及挑戰規範性詮釋架構的企圖；曼素恩對女性文學研究者最大的啓發，一是完整討論完顏暉珠編纂《國朝閨秀正始集》的始末，以「正統」的概念爲閨秀文學定位。一是強調清代女性與通俗文學的關係，她指出雖然晚明女性極可能閱讀小說戲曲，甚至開始創作戲曲，³但是談到以女性爲主要訴求對象的通俗敘事文類在商業出版市場上占得一席之地，以及女性投入此類作品創作的現象，那麼清代肯定更具代表性。這一點在其他學者的專題研究中有所發揮，下文另將論及。

翻案思考在女性文學研究中的表現也清晰可見，在此可舉方秀潔(Grace S. Fong)對女子絕命詩的解讀爲例(Grace S. Fong, 2001)。女性或因戰亂，或因家庭變故，爲了全貞全節而自毀，臨死前留下絕命詩句以明其志，這種舉動在當時是節烈模範，但在20世紀以後，則被解釋爲女性受到壓迫而命薄如紙，成爲女性喪失自主性的身體證據。方秀潔明確反對這種過於簡化的解釋。她指出女性的身體本是生產社會與文化意義的場所，所以女教規訓往往透過女體進行(纏足、割股都是極端的例子)，然而自主性或能動性(agency)也可能透過同一個身體而展現。同時，文本又是女性藉由書寫活動創造的另一種「身體」。當女性在絕命前留下文詞時，女體與文體於是融合爲一，而文字的可傳世特質便可能使該女性的生命免於被徹底遺忘的命運。因此，女性的絕命詩不是受壓迫的呻吟，而是女性確立自我的搏鬥過程。這種逆向思考的方式不一定受到高彥頤對纏足習俗的解釋方式的影響，但確有聲氣相通之處。實在說，既要將原本被摒棄於文學經典之外的女性文學作爲學術研究的材料，又要重估其價值，那麼某種程度的翻案思維是必須的條件。經典概念與女性文學的並立並存，或說女性文學對經典概念的修正、改寫甚至顛覆，正

3 晚明婦女的戲曲作品多已散佚，今存者惟午夢堂家族葉小紉的《鴛鴦夢》。

是這一大翻案文章的開篇。

(二) 女性文學經典觀及其省思

筆者在上一小節已經提到，與婦女史的翻案論述相輔相成，文學研究者的著力點在於首先挖掘、搶救已經沉埋消逝的女性文學，繼之探索這些於文學史邊緣徘徊的女性作家與作品，並試圖向中心移動，以改變文學史的面貌。經過多年努力，女性文學研究至少說明了女性在明清時期文學發展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不論是作為文學的讀者、評者、作者、流傳者乃至於出版者，她們的活動其實都極為活躍與多元，她們留下的文學史料足以使明清文學史的整體圖像大幅改觀。換句話說，明清婦女文學研究已不再限於為文學史「補遺」的功能，而是開始重構文學史的版圖。女性的文學活動已不再是明清文學史邊緣的點綴篇章，而是核心的一部份。這種女性文學經典化的努力是近年的女性文學研究值得驕傲的成就。以下分就幾個研究方向進行討論：

(1) 經典觀的建立 —— 女性作品的蒐集、編輯、出版與評介

對女性作家與作品的蒐集整理由來已久，明清當時，女性既積極參與文學活動，文人與才女也同時開始注意此一現象並有所評述；20世紀初期，又有一波女性文學史的編纂風潮。在晚近的女性文學研究中，前人的編纂與評述工作於是成為重要的後設研究題材。同時，新出的女性作品選集與翻譯更呈現了當代編纂者（也是研究者）對女性文學的學術視野。

對明清時期婦女作品編纂工作的探討，首推明清女性文學研究開山鼻祖之一的孫康宜。她的研究追蹤了明清人如何進行婦女作品的蒐集、編輯與出版，以及匯集有關婦女作者的記載 (Kang-i Sun Chang, 1997)。在此一開創風氣的重要論文中，孫康宜分析了眾多明清時期的婦女選集，包括《名媛詩歸》、《古今女史》、柳如是與錢謙益合編《列朝詩集》的「閩集」，《詩媛八名家集》、《名媛詩緯》、《眾香詞》、《隨園女弟子詩選》、《國朝閩秀正始集》、《宮閩文選》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開宗明義地提出，明清當時男女兩性都有人以選集的方

式重新評價女性作品，而且具有「經典化」的企圖。最直接的證據是編選者往往刻意將女性作品與《詩經》、《離騷》等詩傳統的最高經典相比，而女詩人則被冠以女中才子、女史、名家等名號，以強調其文才。經典的概念可說是孫康宜探討明清女性文學的主要關懷，而男性文人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受到她的重視 (Kang-i Sun Chang, 2001)。這一觀點對日後明清女性文學的研究影響深遠，後來又結合了當代學術眼光下的女性作品選集編纂工作，為女性文學經典觀奠下穩固基石。

由女性與經典的概念出發，我們也必須再度提起曼素恩對清代完顏惲珠編纂《國朝閩秀正始集》的討論。惲珠深信詩作可以表現閩秀的道德情操，從而見證當代（清代）的盛世景觀，因此致力蒐集、編選清代閩秀的詩作，並於 1831 年出版了《國朝閩秀正始集》。惲珠死後，其孫女妙蘭寶又續編了《正始集》續集。惲珠的編選事業可以說完成了盛清以前的清代婦女詩作總集，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曼素恩在探討盛清婦女文化時，就特別以惲珠及其編選事業作為婦學與才女文化的代表。根據曼氏的分析，惲珠雖然廣收當代天下女士作品，但編選策略卻明白排斥青樓文學，這就反映了清代閩秀文化取代晚明青樓文化的現象，也說明了作為閩秀代表的惲珠本人如何意欲藉由編選當代婦女詩作，建立以婦德為中心的新女性典範 (Susan Mann, 1997)。⁴

明清女性的文學評論也有學者注目，其中方維儀、汪端、沈善寶三人的相關研究較有代表性。方維儀 (1585-1668) 著有《宮閩詩史》與《宮閩詩評》，書今雖不見流傳，但據學者判斷，《詩評》應即由《詩史》的評論部分所析出，且以正邪區分閩秀與非閩秀的作品 (連文萍, 1999)。此一研究的論證雖因作品本身不完整而有所缺憾，但仍具有參照價值，因為學者所解析的這個以身分與道德為標準的評判策略與惲珠不謀而合，而與晚明名妓出身的柳如是顯然有所分歧。⁵ 那麼，我們或許可以

4 相關討論，參見胡曉真，〈「皇清盛世」與名媛閩道 —— 評介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6 (1998 年 8 月)，頁 247-258。

5 《列朝詩集·閩集》將閩秀與名妓同列於「香奩」類，不加區分。

將惲珠與方維儀一起考慮，雖然時代有所差距，但她們分別以評論及編選的方式，共同打造以閨秀與婦德為準則的才女文化。汪端（1793-1838）是陳文述的媳婦，她的詩集《自然好學齋詩鈔》收詩超過一千首，而且造詣極精；同時，她還著有《明三十家詩選》，創下女性批評男性詩人與作品的第一例，這更確立了她在清代閨秀作家中的特殊地位（蔣寅，2001、2002；Ellen Widmer, 2002）。她明顯擺出了經典的姿態，也因此受到了當代學者的重視。到了清代中後期，沈善寶（1808-1862）為使歷代才女不致湮沒，遂作《名媛詩話》以傳揚之。較方維儀幸運的是，此書流傳至今，讓我們得以窺見一名清代女性評論閨秀詩的面貌。沈善寶企圖藉由《名媛詩話》的編輯來建立女性文學的經典，而她的視野則已由閨秀、青樓之分轉為對卓越女性的表彰了（張宏生，2002；Grace S. Fong, 2000）。由柳如是、方維儀、惲珠到沈善寶，由清初、盛清到清代後期，這些女性所呈現的文學視野，究竟是個人才學氣質的不同，還是代表時代典範的移轉？這必是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

1910 到 1920 年代，連續出現了好幾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女性文學史料。最早的幾部中國婦女文學史也都是這一時期的產品，例如謝無量《中國婦女文學史》（1916）、梁乙真的《清代婦女文學史》（1925）以及譚正璧的《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1935）皆是如此。⁶ 在男女平等觀念初興的時代，這些男性學者都主張中國婦女文章之所以不如男子，並非由於心智本質的優劣，而是教育境遇使然，所以當世欲勸勵婦學，便須重新考辨婦女文學升降的軌跡。這幾部早期的婦女文學史著作中，謝著雖是通史，但止於明代，與本章的討論只有間接關係；梁著則是斷代史，接續謝著，專以清代為主；至於譚著雖然也是通史，但眼光別具特色，在處理宋元以後文學史，以小說、戲曲、彈詞為重點，這就與梁乙真以詩詞為主的視角相當不同了。雖然此一時期的婦女文學史著作在視野上有其侷限，但至今仍是必要的參考資料。在文學史著作以外，20 世紀的學者也仍然從事女性文學之目錄考略類的功夫。例如王蘊章編《然脂餘

6 譚正璧的著作後來數經增補再版，曾分別以《中國女性文學史》（1935）、《中國女性文學史話》（1984）的書名出現，最後又定名為《中國女性文學史》（1991）。

韻》，就是專錄女性詩人與作品的詩話。本身即是清末民初才女的施淑儀與單士釐，分別著有《清代閨閣詩人徵略》(1922)與《清閨秀正始再續集》(1918)、《清閨秀藝文略》(1944)。單士釐視《清閨秀正始再續集》為《正始集》的續集。另一方面，《清代閨閣詩人徵略》輯錄了清代一千餘位女詩人的資料，包括姓名、著述與事蹟等。施淑儀在〈例言〉中指出她的編選策略乃以女性的文藝成就為標準，婦德並非本書的著錄原則。施淑儀雖然時常採用《國朝閨秀正始集》的資料，但這個文藝為先的宣言顯然與清代的惲珠大不相同。稍晚的洗玉清則著有《廣東女子藝文考》(1941)，別以地域為區分。不過，20世紀有關婦女文學最宏大的學術成就，仍當推胡文楷的《歷代婦女著作考》(1957年序)。此書處理範圍由漢魏六朝降至清代，甚且及於20世紀，實為婦女文學研究最大之寶庫。而清代婦女著作的資料在全書21卷中就佔了15卷，可見其比重之大。這些有關婦女文學的目錄考略類著作，其體例雖與現代的文學史不同，事實上也應與上文所述的幾部文學史著作一併參考。

美國漢學家魏愛蓮對明清女性文學關懷已久，她曾對五四時期出現的明清女性文學史與史料纂集進行討論，一一分析各家的理論背景、文學史觀以及其貢獻與侷限 (Ellen Widmer, 2001)。作為當代代表性的明清女性文學專家，魏愛蓮一針見血地指出，近二十年來讓學界驚豔的大量明清女性文學史料，在20世紀初期其實仍為人熟知，反而是在五四文學大計的推進過程中才被模糊化的。她發現，明清女性文學作品中的許多性別意識概念，並未為五四的「進步」文學史家所重視。例如，鄭振鐸之所以在《中國俗文學史》(1938)中提到女性作品，重點不在性別，而在民間性、通俗性及演出性，然而鄭氏的偏重卻往往與女作家本身的閨秀階級與文學認同有所抵觸，這一點在女性彈詞小說的例子中格外清晰可見。譚正璧的《中國女性文學史話》(1930)雖然以女性為主體，但魏愛蓮指出，譚氏仍受限於「一時代有一文學」的史觀，並且完全無視男性文人與女性作者的互動。倒是那些表面上沒有文學史觀主導，編輯與出版體裁也依循舊例的史料纂集之作，反而開放了更多的可能性。魏愛蓮對20世紀初女性文學史編纂策略的回顧，一方面具有解釋20世紀初

歷史與文化脈絡的作用，一方面則亦是我們在當代處理女性文學材料的自我反省的借鏡。

在這一節的最後，我們必須將當代學術界的女性文學選集納入視野。在國外漢學界，女性作品的編選與翻譯以及作者的資料彙編是很重要的研究成果指標，也會對未來的文學史教學產生影響，讓女性作者與作品有機會正式進入教學體系。對中文學界而言，這些成果在其選編策略上展現的學術眼光亦自有參考價值。最近幾年我們看到漢學界出現了兩部重要的大型女性文學選集。其一是 Kang-i Sun Chang (孫康宜) 與 Huan Saussy 合編／譯的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這一選集分創作與批評兩大部分。創作部分依時代先後排序，上起漢代的班婕妤、蔡琰，下迄 20 世紀初的秋瑾、徐自華，附有作者的生平簡介。就份量言，明以後的作品佔大部分，其中，17 世紀以後的作品又多於之前。批評部分包括女性與男性文字，也分別依時代先後排列。編者既是明清女性詩詞研究的開山鼻祖，本選集收錄的作品也限於詩詞。這其實也反映了 20 世紀九〇年代初期女性文學研究的實況，亦即學者的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在詩詞上面。第二部大型選集去年 (2004) 才出版，即 Wilt Idema 與 Beata Grant 合編／譯之 *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本書書名的「彤管」一詞就是女性書寫的代詞，不過其編輯策略與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一書不同。書分 16 章，基本上也依時代先後排列，但其下又視時代特色以作者身分 (如宮廷、閨秀、尼道、妓女)、文類 (如詩詞、戲曲、彈詞) 等等標準分節討論，以凸顯某位作者或者某作者群的特性。此一編輯策略包容各種書寫形式，因此在詩詞以外，主要以短文、戲曲、小說 (包括白話與彈詞小說) 知名的作者及其代表性作品，也都得以入選，更為全面地掌握並呈現中國婦女的文藝活動，這也是九〇年代後期以後女性文學研究範圍擴展的反映。另一部值得注意的選集是 Susan Mann and Yu-yin Cheng 編譯的 *Under Confucian Eyes: Writings on Gender i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此書並非女性作品的選集，而是以性別觀為焦點選譯唐代以降的相關論述，收錄文字的作者包括男女兩性。明代以後的入選文字中，許多都屬於女性文學的範圍，例如季嫻自傳性的〈前因紀〉、顧若璞示子的家書、明清婦女尺牘、王端淑的短文、吳藻的〈飲酒讀騷記〉等，譯者都是該領域的代表性學者。

(2) 經典觀的反思

在當代學者的敘述中，晚明以後的某些文人閨秀被描繪成隱然具有經典意識的作者，他們透過選集編纂的工作，試圖為女性建立文學傳統與經典地位。從孫康宜對明清女性詩詞選集之編選策略的解讀開始，乃至曼素恩對惲珠徵選婦女作品事件的研究，以及魏愛蓮對 20 世紀初婦女文學史的檢討，都在此一解釋框架內。至於當代學者所進行的選集編纂（包括翻譯），更可視為新的女性文學經典化工作。不過，方秀潔在最近以晚明的女性選集為例，對此一詮釋典範提出反省，值得注意（Grace S. Fong, 2004c）。她認為，晚明女性選集叢出，必須考慮背後的市場價值，同時，正因為女性識字機會增加，學詩日漸成爲一種日常生活的實踐，晚明的女性選集風氣不見得能當作女性文學經典建立的嘗試。方秀潔發現，16 世紀的一些選集一再重複唐、宋時期少數著名女作家的作品，對明代當時的作品並不重視，或者只以「存餘」的觀點出發，收錄許多無名女子的單篇作品甚至零星的隻字片語，因此無從建立所謂的經典。16 世紀晚期到 17 世紀的選集雖然比較重視明代作品，但是仍然沒有一部選集展現建立經典的企圖。

方秀潔將晚明的文學風氣與閱讀市場納入考慮，重探晚明女性選集的編纂意圖，我認爲並不在於推翻女性文學研究的經典觀，倒是嚴肅地提醒我們，在進行文學史版圖重劃的工作時，確實有很多文本內外的跡象提供研究者提升女性文學地位的可能性，然而，我們更應同時考慮其他反向的證據與詮釋觀點，以免我們在掙脫原來的學術典範的視角限制時，不自覺地給自己設下了新的限制。類似方秀潔對經典觀的反省，其實正指出女性文學研究在累積成果並形成典範的當下，可能也到了要自

我質疑與自我挑戰的階段了。

二、女性觀照下的清代女性文學研究

從女性觀點出發，文學研究的版圖大為拓展，而為了另闢蹊徑，研究者無不致力發掘新文本，並且試圖提出新的議題。以下筆者將說明清代女性之研究的幾個重點議題，以分析目前主要的趨勢以及未來較有潛力的發展方向。

(一) 才、德、名、命 —— 女性的文學活動與文學論爭

在文學研究的領域裡，除了作者與作品本身以外，還有文學活動的問題，清代女性文學雖以閨秀為主體，但不乏師友交遊、文藝結社等活動，更牽引出相關的女學論爭，這些都是上好的研究題材。

女性的交遊與結社活動方面，比較受到學者注意的包括：任兆麟與吳中十子 (Dorothy Ko, 1993)、袁枚與隨園女弟子、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詩人 (鍾慧玲, 2001) 等，這些研究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當時的文學活動脈絡，以及女性在其中與男性互動的方式。此外，女性參與文學活動的論辯也值得關注。女性弄文風氣既盛，於是婦女之德與才、德與命，以及才與名之間的關係便成為關注的焦點，清代不少著名的學者都曾做過相關的探討，而女性也未曾在這場論辯中缺席。這個有趣的現象自然成為當代學者注目的焦點 (劉詠聰, 1998；孫康宜, 1993)。女子以無才為德的說法植根於德先於才的傳統思想，清儒也多從其說，甚至主張有才多致敗德。本身知書通文的女性，也不乏嚴厲批評女子弄文者。不過，另一方面，反對才德相斥者也大有人在，就連《女範捷錄》這樣的閨範教本也主張才德不必相仿，而最講究門風家法的桐城名家姚鼐也曾主張女子只要明於義理，未嘗不可從事文章吟詠之事。⁷ 女詩人中，夏伊蘭的〈偶成〉詩為現代學者一再徵引，主要就是因為她在詩中積極主張人

7 姚鼐，〈鄭太孺人六十壽序〉，《惜抱軒文集》，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61-62。

不分男女，皆以才德兼備為上善。⁸ 然而，最具代表性也最為大家熟知的女學論爭，自非袁枚與章學誠的公案莫屬。袁枚廣收女弟子，達四十餘人，作品編為《隨園女弟子詩選》，晚年還曾在杭州大會諸女士，這在當時自然十分引人側目，也激起反對的聲音。章學誠就是反應最激烈的一個，曼素恩便對此進行了精彩的研究。她詳細分析章氏在〈婦學〉一文中如何嚴厲指責當代閨閣不顧男女之嫌，競刻詩稿，反而貽笑大方。文中並且直斥自命風流的「無恥妄人」，引誘名門閨秀標榜聞名，所指即是袁枚。⁹ 面對章學誠的指控，當世女詩人並未因此噤聲。名列袁枚門下的才女駱綺蘭便刊行《聽秋館閨中同人集》(1797)，並在〈序〉中對反對女性作詩的意見一一批駁，直呼反對者為「私」、為「刻」，「非醇厚君子」、「蚩蚩者」、「少所見多所怪」等等，可謂與章學誠針鋒相對，口角錚錚。¹⁰ 這樁婦學論爭直接牽涉提倡與反對女子詩文的人文學者，以及追求文藝成就的女詩人本身，無怪乎當代學者也多所討論(Susan Mann, 1992)。大體說來，女性的文學活動與文學論爭總是圍繞著才、德、名、命這些主題進行，研究者對這些現象的勾勒與解釋則為作品產生的情境作一註解，然而作品文本的解析又是另一番功夫了。

(二) 個別作者的研究

有特別成就的單一女性作家自然容易吸引研究者的目光，陳寅恪在上世紀五〇年代所寫的《論再生緣》(1953~1954) 與《柳如是別傳》(1954) 是最好的例子。陳寅恪在文章中考證彈詞小說《再生緣》的作者為乾隆朝的才女陳端生，並盛讚其藝術與思想成就，甚至認為《再生緣》比杜詩還要偉大。他稱讚陳端生是當時思想最超越的女人，藝術修養又超越

8 夏伊蘭，〈偶成〉，《吟紅閣詩鈔》，收入《國朝閨閣詩鈔》，冊9卷3，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1526，頁649。

9 章學誠，〈婦學〉，見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內篇卷5，頁531-553。

10 駱綺蘭，〈聽秋館閨中同人集·序〉，引自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939-940。相關討論可參見Robyn Hamilton, "The Pursuit of Fame: Luo Qilan (1775-1813?) and the Debates about Women and Tal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Jiangnan," *Late Imperial China* 18:1 (1997), pp. 39-71。

知名大文學家，而且他對陳端生的崇高才情與遭際不偶，寄予了最大的同情與理解。之後，陳寅恪又寫了《柳如是別傳》，追溯明清之際錢謙益與柳如是的一段因緣，對其孤懷遺恨三致意焉。幾年後，郭沫若在讀了陳寅恪的《論再生緣》也對陳端生發生極大的興趣，並在一年內連續寫了〈《再生緣》前 17 卷和它的作者陳端生〉等一系列文章。¹¹ 這個研究傳統在近年的明清女性文學研究中得到繼承，例如孫康宜在正式進行明清女性詩詞的研究之前，已在晚明詩人陳子龍的討論中涉及柳如是，¹² 後來也曾以柳如是與徐燦為例，討論女性文學的風格問題。¹³ 陳端生與其《再生緣》一書則在清代女性彈詞小說的研究領域中領一時風騷，幾乎所有相關研究都從此展開，參見本文的討論。

其他常獲得研究者青睞的女作家，還包括葉氏家族女性、徐燦、王端淑、汪端、顧春、吳藻、沈善寶，以及秋瑾等人。其中，葉氏是著名的晚明才女家庭，一門母女四人皆以才名，兩名女兒早夭的命運更添傳奇性，而存活的葉小紉創作《鴛鴦夢》，正是至今傳世的惟一明代女性劇作（李栩鈺，1997；華瑋，2003）。徐燦（湘蘋）是著名的明末清初女詞人，《白雨齋詞話》將她與李清照相提並論。她的《拙政園詩餘》一方面蘊藉溫婉，一方面流露故國之思，對其夫婿之仕清深懷遺憾，因此展現了獨立的思想與道德觀（孫康宜，1993b；黃媽梨，1999a；鄧紅梅，2000：第七章）。王端淑（玉映）也是清初重要的女詩人，並與錢謙益等名士有所往來。她的《吟紅集》卷帙龐大，寄託其離亂感時之思，還編選了《名媛詩緯初編》（鍾慧玲，2000：第五章；Ellen Widmer, 1997）。汪端的詩集《自然好學齋詩鈔》收詩超過一千首，還著有《明三十家詩

11 這幾篇文章都收入《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2 參見Kang-i Sun Chang, *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此書中譯本題名《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李爽學譯，台北：允晨文化出版，1992），更凸顯了柳如是的重要性。

13 Kang-I Sun Chang, "Liu Shih and Hsu Ts'an: Feminine or Feminist," in Pauline Yu ed.,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169-187. 中譯參見孫康宜，〈柳是和徐燦：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中外文學》，卷 22 期 6（1993 年 11 月），頁 8-25。

選》，創下女性批評男性詩人與作品的第一例，確立了她在清代閨秀作家中的特殊地位（蔣寅，2001、2002；Ellen Widmer, 1997）。顧春（太清）則是晚清的滿州女詞人，《蕙風詞話》將她與納蘭性德並提，可見其文學地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學者又注意到顧太清在詩詞之外，還創作過一部《紅樓夢》的續書，這便使她成為目前所知第一位女性的古典白話小說作家（劉素芬，1996；黃嫣梨，1999b；張菊玲，1997）。吳藻（蘋香）是陳文述女弟子中較著名的一位，尤其她著有《喬影》一劇，以劇中飲酒讀騷的女子寄託自己的情志，非常具有分析的深度，因此頗受當代學者的注意（鍾慧玲，1996、1997、1998）。沈善寶則編有《名媛詩話》，藉以傳揚歷代閨秀作家的成就，而且她在評選女作家時，更展現了具有個人風格的思考。另外，學者也發現沈善寶是自傳慾望非常強烈的女詩人，讀者可由她的作品追溯她一生的經歷；因此，在思考傳統女性傳記問題的時候，沈善寶便成為最佳範例（張宏生，2002；Grace S. Fong, 2000）。至於清末的女傑秋瑾，其革命事業與英雄事蹟眾所皆知，然而她也留下了數量眾多的詩詞等作品，流露昂亢的革命精神與民族情緒，使她在晚清的女性文學史上也有一席之地。

（三）從單一文類出發

在個別作者的研究之外，以特定文類為範圍的研究也是比較為學界接受的方向。20世紀初期，著名的英國女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曾指出，在18到19世紀的英國文學裡，多數的女性作家以小說為主要的創作文類，女詩人則較少出現。她並且詳細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女性受限於瑣屑的家庭義務，難得安靜、完整的思考空間與創作時間，因此無法發展需要全心投入的詩才，而轉向可以利用零碎時間寫作、「隨寫隨放，隨放隨寫」的小說（Virginia Woolf, 1979：43-52）。吳爾芙在這裡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那就是作者選擇創作的文類，是否受到性別的影響與牽制？而不同社會、文化與文學傳統下的女性，在創作時是否有不同的思考與選擇？吳爾芙對英國文壇的分析是否得當，那是另一個問題，但是把視野放在同一時期的中國文學的話，我們的觀察又會如

何呢？顯然，女詩人在清代絕非少數，光是有著錄的就超過千人；相對的，女性的小說家則真如鳳毛麟角。女性參與其他主要文類的情況，如散文、戲劇等，歷來也較少引起注意。不過，只要對清代女性文學略作進一步觀察，就會明白以上的認知與實際情況有相當差距。譚正璧對梁乙真最重要的批評，就是梁氏的《清代婦女文學史》只討論婦女詩詞，基本上忽略了其他文類，而譚氏本人的研究則對小說、戲曲、彈詞特別留意。目前，詩詞獨重的研究已有所突破，清代婦女文學的研究已橫跨各種文類，並皆有相當完整的成果。

近年清代女性詩詞的研究已累積許多，美國的孫康宜、Maureen Robertson 等學者都是代表性的先驅人物。孫康宜在處理過女性才德觀、女性選集等議題後，特別關注女性作家與文學經典之關係。Robertson 是當代最早開始研究女性詩人的漢學家之一，特別重視明清才女作品文本的分析，而且以「主體性」的觀念進行討論，可說是婦女研究的經典問題。她最主要的論點是，中國傳統女性的創作過程必須與男性主流傳統形成一個永久的「包容」／「抵抗」的拉鋸戰，透過特殊策略，才能建立自己獨特的聲音 (Maureen Robertson, 1992)。她也對認為所謂「主體」不一定受限於單一的「生物性別」，而是在同一文本中，同時有各種主體在其中作用 (Maureen Robertson, 1997)。Robertson 的研究成果，我在〈最近西方漢學界婦女文學史研究之評介〉一文中已經介紹過，在此不必重複，不過，Robertson 近幾年在明清女性詩詞的研究上似乎較不活躍，這是相當可惜的。

以專書而論，鍾慧玲的《清代女詩人研究》一書應是目前最完整的女性詩的斷代研究。本書分析了清代文學環境與女詩人之間的關係，描述了女詩人的活動與交遊，並詮釋女詩人的創作理論，相當具有參考價值，在清代女性文學的研究上是一大貢獻 (鍾慧玲, 2000)。女性詞作方面，張宏生處理清代女詞人興盛現象的專文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張宏生, 1999)，而鄧紅梅的《女性詞史》一書雖然是通史，但其處理清代詞人的部分共有十章，份量也很重 (鄧紅梅, 2000)。本書既然專以女性詞為處理對象，當然受過現代女性主義的影響，不過跟鍾慧玲的《清代女

詩人研究》一樣，鄧紅梅對所謂傳統研究方法仍相當尊敬，而且她更加重視文本的美學價值分析，這是非常艱鉅的工作。她點出詞較詩更具陰性特質，因此受到閩秀作家的歡迎，但也因為女詞人太擅於以詞的形式表達閨中情緒，往往也限制了自己的美學境界。能夠突破這層無形限制的作者，也就比較容易成為具有經典價值的詞人。¹⁴ 此書還分析了重要的個別作者如顧貞立、徐燦、熊璉、吳藻、顧春、秋瑾等等，展現紮實的精讀功夫。另外，黃嫣梨的《清代四大女詞人：轉型中的清代知識女性》（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2）也值得注意，本書同樣以女詞人為研究對象，但其選樣主要是關懷清代社會與文化的轉型問題，將女性文學與其他學術課題連結起來，這應是未來很可發展的方向。

前文已經提到，晚明以來女性詩詞選集輩出，以致於孫康宜等女性文學研究者一入手便會因其數量之龐大而大為震撼。選集對研究者當然提供了初期的方便，客觀上也使得詩詞成為女性文學研究的主體。相較於詩詞，其他文類的女性創作，如戲曲、小說、散文等，並無方便的選集可用，作者的數目也遠遠不及詩人、詞人，因此在研究的進程上較詩詞為後，顯然更須進一步探索。以小說而論，如果宣稱中國在現代以前曾出現過女性創作的小說，恐怕多數以傳統文學史為依歸的人還是會為之瞠目。事實上，女性創作小說確然有徵。清代才女汪端曾作《元明遺事》一書，雖然被作者本人燒毀而不傳，但各種資料都顯示這必然是說部之類的作品，不是白話小說，就是彈詞，而以前者的可能更大。作品流傳下來，並且可以確定作者為女性的白話章回小說，目前只有晚清顧太清的《紅樓夢影》。顧太清晚年為《紅樓夢》寫續書，並由其女性友人沈善寶作序，這個事件本身無論對小說史或婦女文學史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在眾多的紅樓續書中，顧續也在形式與內容上展現了滿州貴族女性特有的人生體驗 (Ellen Widmer, 2003、200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的《鏡花緣》作者雖然是男性的李汝珍，但題詞者卻不乏當時的閩秀，包括孫雲鳳等人，足見女性與小說的關係還有繼續探索的

14 相關討論可參見Siao-chen Hu的書評，見*Nan Nü: Man, Woma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5:1 (Brill: Leiden, 2003), pp. 124-127。

空間。晚近對明清出版文化與市場的研究中，女性消費的問題也已形成一個重要的討論主題。魏愛蓮最近十年對「19世紀女性與小說」這個問題進行廣泛的研究，令人期待的是，在單篇論文之外，她的專著已預定於2006年出版，屆時我們將終於得以比較全面的掌握清代女性與小說的關係。

無論如何，清代女性在白話小說創作上的表現並不算特別活躍。不過，如果我們懸置文學史對小說的認知，而回到現代以前的「說部」概念的話，則女性作者與讀者的角色就會更加清晰。由晚清諸多有關啓蒙與小說的論述可知，當時對婦女影響最大的敘事文學形式其實是彈詞。譚正璧在撰寫《中國女性文學史話》時，也提出類似的觀察，且其後此書修訂出版時，增補的資料許多都與彈詞有關。而鄭振鐸、阿英、李家瑞、趙景深、胡士瑩、陳汝衡諸家也都有相關的討論。彈詞小說基本上以七字體行文，實質上就是一種韻文體的小說，在清代的南方極為盛行，尤其受到婦女的歡迎。如以譚正璧的《彈詞敘錄》與《評彈通考》為依據，女性創作的彈詞小說超過30種，其中包括著名的《天雨花》、《再生緣》、《筆生花》等書。這些作品篇幅多半極為龐大，說部的傳統更讓閨秀得以發揮想像，展現自我，並且洩漏深沈的欲望。譚正璧以後，有關女性彈詞小說的探索雖然不時出現，不過迴響並不太大，即使陳寅恪與郭沫若品鑑《再生緣》，也只能造成短期的熱潮。近年，清代女性彈詞小說的研究再次興起，並且發生相當的影響力，逐漸改變了我們對清代女性與敘事文學之關係的認識。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筆者的《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與鮑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前者總結了作者從九〇年代中期以後相關研究，藉由彈詞小說探討清代女性的閱讀與書寫活動，以及面臨現實中政治、社會或思想的巨大變遷的彈詞女作家，如何在文字世界中表達焦慮與困惑之情，或者構築自己的詮釋系統與對應方式。本書指出彈詞小說作者透過文字因緣而跨越時空界線，用龐大的文本編織出無形的網絡，形成了女性的小說傳統。她們的作品馳騁光怪陸離的想像，玩弄陰陽性別的符碼，

透視日常生活的現象，重新詮釋男性掌握的歷史，並且苦思糾纏人生的終極追求。本書主要處理的文本包括《玉釧緣》、《再生緣》、《再造天》、《榴花夢》、《精忠傳》、《夢影緣》、《鳳雙飛》等重要的清代女性彈詞小說作品。後者則由作者的博士論文修訂而成，考察了彈詞小說的源流與發展，對主要的女性彈詞小說作者與作品一一進行考辨與分析，並針對女傑形象、男女喬裝、女性情欲、仙佛意識等議題展開詮釋。除此兩種專書外，相關的單篇論文也在迅速累積中，¹⁵ 未來，女性彈詞小說應仍是清代文學的重要領域。

戲曲是清代女性另一項重要的文學表現。根據已知的資料，清代女性劇作家有 19 人之多，其身分全都是閩秀。她們的創作主題相當多元，除了婚戀之外，自我與社會也都是女作家藉由戲曲創作所探索的問題。這方面研究最集中的呈現，當是華瑋的《明清婦女的戲曲創作與批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 一書中有關清代的部分。此書是第一部全面探討明清婦女戲曲家與批評家的專著，除了戲曲創作以外，還探討了程瓊、吳震生夫婦合著之《才子牡丹亭》，結合了對婦女之創作與批評的研究，並且由新的視角論證當時女性的情感、欲望與藝術觀。¹⁶ 另外，華瑋也已編輯《明清婦女戲曲集》一書(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選錄了 10 種重要的婦女戲曲創作，其中除晚明葉小紈的《鴛鴦夢》以外，都是清代的作品，作者包括王筠、吳藻、何珮珠與劉清韻。這是第一部明清婦女劇作的選集，對古典戲劇與婦女文學的研究都將具有參考意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書所收的劉清韻作品，還包括了九〇年代才發現的《拈花誤》與《望洋嘆》兩種，這兩種劇本目前都只存手抄本，極具資料價值。

在戲曲小說之外，書信也是學者注目較多的形式。早在 1989 年，魏愛蓮就探討了明末清初閩秀尺牘的相關問題 (Ellen Widmer, 1989)。本文通過閱讀《尺牘新語初編》、《尺牘新語二編》及《尺牘新語廣編》，

15 如林娜、盛志梅、許麗芳等學者都有相關論文。

16 華瑋已完成《才子牡丹亭》點校本的工作並正式出版。參見(清)吳震生、程瓊批評；華瑋、江巨榮點校，《才子牡丹亭》(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4)。

試圖重建明清之交文學才女彼此間聯繫的網絡，以及她們與男性文人的關係。由女性寫作的書信的流通狀況，可探知明清之交的動亂中，許多女性有機會和外界聯繫，或與淑女往還，或與名妓相交，或與名士對談，而書信正是這群積極參與文化活動的女性們賴以跨越藩籬的最佳工具。最近，羅開雲 (Kathryn Lowry) 也進行有關晚明婦女書信的研究，她發現當時婦女時常寫作情書，並且大量引用通俗戲曲小說，而情書本身也具有情節性，使得讀者可以把書信當作小說來讀 (羅開雲，2002)。據此，她指出明代尺牘集中女性書信的特質似乎與清代的不同。如果以魏愛蓮的研究為起點，而以羅開雲的研究為對照的話，清代女性的書信應有更大的探討空間。

從文類出發的研究，如果出自訓練良好的學者之手，都會累積相當的文本份量，耙梳歷史與文學史的脈絡，也有焦點集中、議題清晰的好處，因此就算是不重視女性文學的學者，也大致能承認這些成果在文學研究上做出了基本的貢獻。這可以說是其幸運之處，卻也側面說明了女性文學研究畢竟仍處在邊緣地帶，這一點相信身在其中的研究者多少都有感受。

(四) 近現代轉折期的女性文藝現象

在中國文學的研究領域中，古典與現代往往分流，能夠或者有心會通兩者的可謂鳳毛麟角，這在女性文學的研究也是如此，這其實是囿限了理解的深廣度以及詮釋的可能性。以本文的處理範圍而論，所謂清代，如果不能至少上溯晚明，下接晚清民初的轉型期，那麼反而不能呈現此一時期在歷史以及文學史上的特質。奇怪的是，晚清與五四之間 —— 亦即 20 世紀初 —— 這段時間距今不過百年，但是我們對此一期間的女性作家與作品，了解得比 17 到 19 世紀之間的女性文學還要少。似乎從秋瑾以降，就要等到五四以後才能見到新一批女作家了。這個現象也確實有其歷史背景，畢竟晚清以後，英傑秀異的女子有了更多生命的選擇，而盛極一時的才女文藝現象也不免漸趨衰蔽，逐漸邊緣化，終於與舊式閨秀文化一併失落了。不過，任何個體或文化現象都不能在一夕間改變，

晚清民初時期那些轉側於新舊之間的女性身影如果就此湮滅，所有——特別是明清——女性文學研究者都會痛惜，更何況轉型期的現象理應受到史家與文學研究者的注意。

世紀初轉型期的女性文學現象這幾年終於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總算還不太遲。在這一堪稱新興的領域中，原本鑽研晚清文學與文化的學者有近水樓台之便，較易構建體系，因此其研究成果往往最為可觀，夏曉虹是其中代表。她的研究介於歷史與文學之間，但體系完整，始終都是晚清文化研究者不可不讀之作（夏曉虹，2004）。台灣的黃錦珠多年來致力於晚清小說的研究，最近出版的《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雖然並不以女性文學為探討對象，卻也為相關領域提供了小說界的背景。

當然，如果以女性文學的觀點來看，那麼還有許多議題尚待開拓。以目前已出版的論著來看，胡纓在處理五四以前「新女性」的形成問題時，對晚清民初時期才女傳統的轉變多有著墨（Hu Ying, 2000），她以中文發表的單篇論文也詳細探討了梁啟超對才女傳統的負面論述以及其重大影響（胡纓，2001）。筆者個人因為對女性彈詞小說進行研究，也留意到晚清乃至民初以後，此一傳統受到新的文學市場影響而產生的轉變，於是透過「最後一位女性彈詞小說家」姜映清的例子，來說明此一轉變的發生過程與結果（胡曉真，2003）。也正由於此一研究引領我注意到報刊雜誌對女性文學的影響，所以後來我在探討民初《婦女雜誌》所呈現的女性文藝面貌時，也由此一觀點入手，試圖解釋傳統才女文藝在20世紀初的困境，以及新式文藝發生之初的掙扎（胡曉真，2004）。此外，傳奇人物呂碧城的生平與作品最近也再度引起注意，除了劉納的《呂碧城評傳／作品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與李保民編的《呂碧城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陸續出版，提供基本材料以外，方秀潔也在近期開始探索呂碧城其人與其作品的時代意義（Grace S. Fong, 2004a）。她認為呂碧城刻意追求教育家、作家、傳統詞人、世界人、商人、宗教人等各種角色，並且執意以傳統的詞的形式來表達現代的（尤其是外國的）經驗。因此，呂碧城的例子正可展現所謂「現代性」具有

非常複雜的面貌，也迫使我們以多元的方式思考 20 世紀初期，中國本地與全球文化情境下的（女性）主體。

在集體性研究成果方面，方秀潔、錢南秀與 Harriet T. Zurndorfer 合編的 *Beyon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Gender, Genre, and Cosmopolitanism in Late Qing China* (Brill: Leiden. Boston, 2004) 較有代表性。此書內容原以專輯形式發表於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6:1 (2004)，討論的焦點正是晚清民初的轉型問題，試圖跳脫傳統性與現代性對立的詮釋框架。其中與女性文學直接相關的部分，我已經介紹了方秀潔對呂碧城「另類現代性」的思考；另外還有錢南秀研究晚清才女薛紹徽在《外國列女傳》中呈現的婦女道德觀，這又是一個連結了新舊、中西典範的例證。這一專輯的原班人馬（加上若干新血）又於 2005 年春在 Rice University 舉辦了“Beyon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Gender, Genre, and the Negotiation of Knowled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研討會，集合歷史與文學的學者繼續探討清末民初的轉型問題，發表的會議論文中也有好幾篇與女性文學有關，例如 Harriet T. Zurndorfer 的“Beyond Good Wifehood and Good Scholarship: Wang Zhaoyuan (1763-1851) and the Vanished ‘Talented Women’”，以才女傳統的失落為主題；方秀潔的“*Inscribing Cosmopolitan Space and Time: Lu Bicheng’s Travel Writings from the Shanghai Period (1913-26)*”一文繼續探討呂碧城的旅行書寫；錢南秀的“*The Mother Nu Xuebao versus the Daughter Nu Xuebao: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1899 and 1902 Women Reformers*”透過兩份晚清的女學報探討女性觀念在短期內的劇烈轉變等等。其他論文雖不屬女性文學範圍，也都對性別與文化轉型問題提供參照。由這些當前正在進行的研究可知，20 世紀初轉型期女性文學的研究，更加需要結合歷史脈絡的詮釋，才能解釋其中何以產生某些特殊的變化，例如才女文化的迅速衰落、才女的特異的人格與文學表現等等。我認為這個領域在可見的未來會是研究的熱點，也很有潛力出現跨學科努力下的精彩論述。

(五) 其他議題

在文類劃分以外，群體也是清代女性文學研究中較易發揮的課題之一。女作家群體的形成與發展往往與地域、家族與文學團體密切相關，這也是研究所循的主要路線。例如湖州、常州、徽州等地區女學興盛，有一些共同的社會與文化因素，但又因地域特色有所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現。例如吳地的閨秀自負文才，徽州閨秀則堅守貞潔。在文學團體方面，自以袁枚的隨園女弟子與陳文述的碧城仙館女弟子為最受注目的兩個文學圈子，而以任兆麟為師的「吳中十子」之清溪吟社也應得到進一步的觀察 (Dorothy Ko, 1993)。以家族為中心之女作家群體的例子更多，例如張惠言家族的女性詩文傳統，就是極佳的探討標的。

此外，以特定議題為核心的方向，在清代女性文學研究中也值得一提。在這一方面，美國學者高彥頤可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她質疑今日我們以現代標準去衡量古代，未經深究，就貿然以今人的眼光來概括婦女生活的情況。於是她開始重新詮釋一般認定為「壓抑女性」的社會或文化機制。例如，她以女子寫作稱賞纏足之感官美的詩歌，來證明女子有能力自纏足之中尋取快感及美感。換言之，當時婦女已將這個專屬於女性的習俗，轉化為「女性文化」的一種表現方式。她也認為女子教育被限制在家庭中實施，有其意想不到的好處，那就是閨閣中母女的親密關係成為「女性文化」發展的基礎，這通常是通過母親對女兒施以文學教育而達成的。甚至「內」(女性範圍) 與「外」(男性範圍) 的分野，不但不是「父權」的「宰制」，反而被女性轉化成純淨的「女性文化」空間的保障了。因此，明清的女性不論在社會性上或知性上都充滿著活動力，全然不同於吾人今日對她們的刻板印象。簡言之，女性與社會規範的關係並非單純的「壓抑」或「反抗」，而是一個更複雜的過程，其中包含了包容、談判、顛覆、衝擊等各種情況。基本上，高彥頤的主張，如勿以今人眼光論古人、勿以西方價值評斷中國傳統、應以「商談折衝」的概念取代「壓迫」與「反抗」等，在當前已廣為學者接受。高的研究已屬女性主義的政治議題，既飽含爭議性，又的確潛力無窮，她的討論還涉及女性與權力的關係，也就是挑戰以女性為男性權力受害者的看

法，因為男性的政治權力 (official power) 與女性的家庭權力 (dominated power) 應該要等量齊觀。¹⁷

筆者一向做的是文學研究的工作，文本可說是研究的生命。不過有趣的是，觀察當前婦女史與女性文學研究的發展，文字文本以外的材料似乎有愈形重要的趨勢。就明清女性生命的實況來看，就算只以文藝為範圍，文學訓練確實也只是其中一環。例如，這兩年方秀潔與高彥頤各自對女性的刺繡活動作了研究，兩位學者展現了不同的研究偏向。方秀潔的研究仍以文本為主，她首先指出，刺繡對傳統閨秀而言，雖是一種日常的手藝，卻也形成一種專屬於閨秀階級的知識體系，但到了 20 世紀，刺繡則由閨秀的藝術轉變為女性勞動者可以賴以維生的工作方式，所以刺繡的地位變化見證了歷史的演進。方秀潔繼而分析了晚明到民初三種女性的繡譜類著作，即張淑英的《刺繡圖》、丁佩的《繡譜》以及沈壽的《雪宦繡譜》，以細密的文字解讀追蹤刺繡觀念的變化 (Grace S. Fong, 2004b)。至於高彥頤則主要以沈壽為對象，探討 20 世紀初對「美術」與「工藝」概念的區分，沈壽如何在此過程中形成現代化的美術觀，而在國際與性別的交錯點上，沈壽又如何在中國與外國被理解為不同的形象與成就 (Dorothy Ko, 1997)。當然，這樣的研究取徑實已不在女性文學的範圍內，不過正與高彥頤之前的許多研究一樣，仍為文學研究者提供了別出心裁的視角。

三、清代女性文學研究未來的展望

放眼未來，20 世紀的主要研究方向應該都會繼續開展。其中，女性創作的分文類考察可能仍是最大宗，而在資料蒐集與考證功夫大體完成後，未來尤應結合精細的文本分析與社會文化的考察。隨著文類考察而來的，則是女性創作的主題式分析，例如扮裝、世變、家庭人際關係等

17 涉及現代權力理論的部分，並非筆者的專長，但讀者可參見Foucault與Bourdieu的多種著作。

問題，以及絕命詩、題壁詩、思歸或思親詩、寄外詩、懷友詩、閒情詩等的呈現，未來都應該進一步探討。其中特別具有論述潛力的，我認為是女性在作品中如何呈現宗教與終極追求的渴望、焦慮與限制等問題。畢竟，我們理應開始探索女性文學超越閨閣閒情的部分，如生活經驗、生命體認、終極關懷，以及與整體知識系統的對應。在牽涉地域的研究方面，目前多半的注意力集中於江南地區，洗玉清的〈廣東女子藝文考〉幾乎是唯一的例外，因此未來應開展對其他地區女作家與作品的探討。

我認為還有一些議題會成為未來的研究焦點。首先，雖然孫康宜等學者已針對女性與經典的關係做過精彩的討論，但此一思考方向仍會提供源源不絕的活水。事實上，女性與經典的辯證關係極為複雜，包括女性本身如何理解經典，是否可能建構某種文學經典，而儒家禮教正典與女性經典又是否曾發生互動？這些問題都應該進行理論的探討。相對於經典概念，出版文化以及其連結的物質、市場、消費等問題，也應該在女性與文學的相關研究中有更進一步的探索。婦女從事創作，不只是花前月下的抒情伸志而已，如要流傳，往往更須與出版機制磨合。例如，惲珠編《國朝閩秀正始集》，其工作何其龐大，從蒐集、徵募、編輯到出版，在在見證女性積極參與文化工作所牽涉的複雜狀況。如果說文學史中女性總還有一席之地，迄今為止，中國出版史則絕無女性側身其間。因此，女性直接介入出版的例子更值得注意，例如梁瑛（1707-95）作品曾分別由徽州出版商吳砥瀾之妻王氏，與揚州出版商原果堂的李氏出版（Dorothy Ko, 1994：64），而侯芝後半生也曾與出版商進行接觸，出版包括《再生緣》在內的多種彈詞小說（胡曉真，2003），這些特殊的個案都還有詮釋的空間，而我們更殷切期盼其他資料被發掘出來，逐步揭開清代女性與出版文化之關係的面貌。再者，所謂德言容工，婦德以外，女性的「言說」、「容飾」、「工作」如何放在女性文學的脈絡中理解？筆者以為這些都會是大可開發的課題。例如文藝與女工的關係就是一個有趣的新興視角（如前文介紹的方秀潔進行的繡譜研究，Grace S. Fong, 2004b），這個研究方向同時牽涉物質文化與筆墨文化兩種領域，非常具有發展潛力。

我們也必須指出，未來的清代女性文學研究必須重新跨越階級的藩籬。早期，談到女作家，西方學者往往直接聯想歷朝名妓、尼姑與道姑。這是因為在西方「東方主義」(Orientalism) 的影響下，傾向於將傳統中國女性視為一體，而不考慮時代、地區、階級、個體等因素。¹⁸ 因此，所謂閨秀處於絕對內外隔絕的環境中，不可能有自己的聲音，而惟有身處社會邊緣的妓女或佛道，才有機會表達真實的自我。相對於此，近年來學者則大幅度修正了以上的看法，本文以上所引證的例子，幾乎全部都在處理傳統閨秀的文學活動。然而，在此趨勢下，除了極少數的例子(如小青與雙卿研究仍歷久不衰)，學界的研究主力便全部放在閨秀階級的女作家身上。清代非閨秀階級的女性的文藝生活景況如何？果然完全受到閨秀才女文化的壓抑嗎？這些都是可以放下成見，重新思考的問題。特別是，女性參與文學與文化活動，在類別上僅限於詩詞、戲曲、小說嗎？在形式上僅限於閱讀與書寫嗎？這些都是可以挑戰的觀念。例如寶卷，其宣講、刊行、傳播都與婦女有密切關係，而寶卷發展到後期，俗世的成分滲入，又成爲一種對平民婦女特別有吸引力的俗文學形式(Daniel Overmyer, 1985)。除非文學研究者自限於菁英文學與文類，否則「寶卷」與它所訴求的平民婦女，當也是潛力無窮的研究對象。同樣的，民族學界注意的江永女書與女歌，雖然以異於漢字的字體寫成，又往往以歌調流傳，但何嘗不可能做爲女性文學研究的題材？¹⁹ 婦女民間文學中潛藏著非常具有顛覆性的動力。尤其經由作爲民間宗教文學的「寶卷」與菁英式的詩詞雅調的比較，我們或者可以對女性與當時的文化有更整體性的考慮。

在本文結束以前，筆者有責任提出幾個有關當前清代女性與文學之研究的問題。首先，最敏感，但也最不應該、也無法迴避的問題是，當

18 這也是清末及五四以來中國人對「傳統」婦女相當普遍的認知。

19 有關女書的研究很多，但以劉斐玟的系列研究最注意其中書寫、歌詠、情意之間複雜關係以及衍生的文學性。可參見她的中文論文：劉斐玟，〈從書寫與歌詠的交織：女書與湖南江永婦女的雙重視維〉，《臺灣人類學刊》，卷1期1(2003)，頁1-49；劉斐玟，〈從「以情為意」到「意由境轉」：江永女書與「訴可憐」〉，收入余安邦主編，《情、欲與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頁225-288。

我們轉移眼光，試圖將眾多早經湮沒的女作家拉回清代文學史中時，是否會出於對女性創作的認同與同情，而有意或無意地擱置文學的評斷標準？如果性別果真成為價值判斷的準則的話，這又是否是我們作為文學研究者所願意付的代價？換言之，每一個從事女性文學研究的人，都必須思考如何才能在文學史中為這些失落的聲音找尋合宜的位置，而所謂美學判斷在天秤上的比重又該如何斟酌。筆者個人以為，發掘女性作家與作品的努力已經累積了相當的成果，未來我們勢必要跳脫補遺、介紹的層面，而直接面對作品的美學評價，以及與文學流變、文化環境、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這在處理女作家輩出的清代文學時，尤其如此。誠然，以上所提的問題，歸根結底都與所謂「經典」的概念有關。「經典」的概念在晚近不斷受到挑戰與質疑，在某種意義上，重估女性文學的工作其實也立足於對傳統經典的懷疑之上。不過，過去的典範與女性之間，是否只存在壓抑的可能性？而今日的對女性與典範的重新思考，又是否一定要造成「好文學」標準迷亂的焦慮？「破」之後，是否一定要有「立」？我們要回答的是一連串極為複雜的問題。

第二個必須提出來的觀察是當前文學研究中，「文學活動」取代「文學文本」成為研究主體的問題。由本節以上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不論是最近的成果或者可見未來的趨勢，諸如選集策略、文人交遊、地域家族、出版市場、權力分析等等議題都是最熱門的切入點，傳統文本精讀的功夫相較之下反而不那麼突出。當然，這個現象也是與當代文學研究相呼應的，因為當前整個文學批評界的大勢所趨是跨學科的，與婦女或性別問題相關的文學研究更是如此。然而，儘管潮流不可抗拒，但文本若從此失落在理論的迷霧中，又豈是任何文學研究者所真心樂見。這幾年來，回歸文本的召喚越來越強，但這不能只是單純的懷鄉症，而必須是經過文化理論淬煉後，重新建構文學文本的主體位置。如何實踐這樣的渴望，也是文學研究者未來的功課。

筆者最後希望提出的問題是如何看待清末民初時期文學閨秀的轉化過程。如果說清代果然存在「才女文化」，那麼同樣受到才女的訓練，但卻剛好身處清末民初轉折期的閨秀，如何調適自己，並看待女性文學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現代女作家正式登上文壇之前，傳統才女如何參與文化活動？這個過程是否與同時期舊式文人的命運平行？筆者以為探索清代女性與文學的問題，不應受限於進步與革命的史觀，而忽視了王朝末期最後的風華。畢竟，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的研究之間實在不該存在楚河漢界。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吳燕娜編，《中國婦女與文學論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9。
- 李翎鈺，《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台北：里仁書局，1997。
- 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上海：上海書店，1987。
-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
- 孫康宜著，李爽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台北：允晨文化，1992。
-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 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 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台北：中華書店，1958。
-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單士釐，《清閨秀正始再續集》。
- 單士釐，《清閨秀藝文略》。
- 華瑋，《明清婦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
- 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 鄧紅梅，《女性詞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 鮑震培，《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
- 謝無量，《中國婦女文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90。
-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0。
- 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上海：光明書局，1935。
- 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

- Bray, Francesca.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Chang, Kang-i Sun. *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Chang, Kang-i Sun and Huan Saussy eds.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Hu, Ying.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Idema, Wilt and Beata Grant eds. *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 Ko, Dorothy. *Teachers of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ann, Susa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Mann, Susan and Yu-yin Cheng eds. *Under Confucian Eyes: Writings on Gender i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Widmer, Ellen and Kan-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Woolf, Virginia. *Women and Writing*.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79.

二、論文

- 王細芝，〈論清代閨閣詞人及其創作〉，《中國韻文學刊》，2001年第1期（總第22期），2001年6月，頁63-68。
- 姚品文，〈清代婦女詩歌的繁榮與理學的關係〉，《江西師範大學學報》，期1，1985。
- 胡曉真，〈「皇清盛世」與名媛闖道 —— 評介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6，1998年8月，頁247-258。

- 胡曉真，〈文苑、多羅與華鬢：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12，2004年12月，頁169-192。
- 胡曉真，〈最近西方漢學界婦女文學史研究之評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2，1994年6月，頁271-289。
- 胡曉真，〈閨情、革命與市場：由民初彈詞小說家姜映清談起〉，收入羅久蓉、呂妙芬編，《無聲之聲（II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文化（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101-135。
- 胡纓（Hu Ying），〈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啓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9，2001年8月，頁1-29。
- 孫康宜，〈明清詩媛與女子才德觀〉，《中外文學》，卷21期11，1993a年4月，頁52-81。
- 孫康宜，〈柳是和徐燦：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中外文學》，卷22期6，1993b年11月，頁8-25。
- 張宏生，〈才名焦慮與性別意識——從沈善寶看明清女詩人的文學活動〉，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821-845。
- 張宏生，〈清代婦女詞的繁榮及其成就〉，《清代詞學的建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 張菊玲，〈中國第一位女小說家西林太清的《紅樓夢影》〉，《民族文學研究》，期2，1997，頁3-7轉18。
- 曹虹，〈清代常州女學與陽湖文派〉，《學人》，期7，1995年5月，頁395-417。
- 許周鶴，〈論明清彈詞文化與吳地婦女〉，《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2，1996，頁98-104。
- 連文萍，〈詩史可有女性的位置——方維儀與《宮閨詩評》的撰著〉，《漢學研究》，卷17期1，1999年6月，頁177-200。
- 陳香，〈清代女詩人書目總索引〉，《書評書目》，第36期—38期，1976年4月，1976年6月。
- 黃嫣梨，〈從徐燦到呂碧城——清代婦女思想與地位的轉變〉，《中國婦女與

- 文學論文集》，第一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9a，頁 115-136。
- 黃嫣梨，〈顧太清的思想與創作〉，《妝臺與妝臺以外 —— 中國婦女史研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b，頁 87-103。
- 劉素芬，〈文化與家族 —— 顧太清及其家庭生活〉，《新史學》，卷 7 期 1，1996 年 3 月，頁 29-67。
- 劉斐玟，〈從書寫與歌詠的交織：女書與湖南江永婦女的雙重視維〉，《臺灣人類學刊》，卷 1 期 1，2003a，頁 1-49。
- 劉斐玟，〈從「以情爲意」到「意由境轉」：江永女書與「訴可憐」〉，收入余安邦主編，《情、欲與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b，頁 225-288。
- 蔣寅，〈汪端的詩歌創作與批評初論〉，《國學研究》，卷 8，2001，頁 143-171。
- 蔣寅，〈開闢班曹新藝苑，掃除何李舊詩壇 —— 一代才女汪端的詩歌創作與批評〉，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 801-822。
- 戴慶鈺，〈明清蘇州名門才女群的崛起〉，《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 1 期 (總第 94 期)，1995 年 11 月，頁 130-133。
- 鍾慧玲，〈吳藻作品中的自我形象〉，《東海學報》，卷 37 期 1，1996 年 7 月，頁 107-128。
- 鍾慧玲，〈吳藻與清代女作家交遊續探〉，《東海學報》，卷 38，1997 年 7 月，頁 39-58。
- 鍾慧玲，〈吳藻與清代文人的交遊〉，《東海學報》，卷 39 期 1，1998 年 7 月，頁 63-85。
- 鍾慧玲，〈陳文述與碧城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東海中文學報》，2001 年 7 月，頁 151-182。
- 羅開雲，〈晚明情書：閱讀、寫作與性別〉，收入張宏生主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 390-409。
- Chang, Kang-i Sun. "Liu Shih and Hsu Ts'an: Feminine or Feminist," in Pauline Yu ed.,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169-187.

- Chang, Kang-i Sun. "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 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7-170.
- Chang, Kang-i Sun. "Gender and Canonicity: Ming-Qing Women Poets in the Eyes of the Male Literati," in Grace S. Fong ed., *Hsiang Lectures on Chinese Poetry*, Vol. 1.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Centre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2001, pp. 1-18.
- Fong, Grace S. "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 (1808-1862) 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Nan Nü: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2:2, 2000, pp. 259-303.
- Fong, Grace S. "Signifying Bodie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Suicide Writings by Women in Ming-Qing China," *Nan Nü* 3:1, 2001, pp. 105-142.
- Fong, Grace S.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or a Classical Woman of Modern China: The Challenging Trajectory of Lu Bicheng's (1883-1943) Life and Song Lyrics," *Nan Nü* 6:1, 2004a, pp. 12-59.
- Fong, Grace S. "Female Hands: Embroidery as a Knowledge Field in Women's Everyday Lif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5:1, 2004b.06, pp. 1-58.
- Fong, Grace S. "Gender and the Failure of Canonization: Anthologizing Women's Poetry in the Late Mi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6, 2004c, pp. 129-139.
- Hamilton, Robyn. "The Pursuit of Fame: Luo Qilan (1775-1813?) and the Debates about Women and Tal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Jiangnan," *Late Imperial China* 18:1, 1997, pp. 39-71.
- Ko, Dorothy. "A Man Teaching Ten Women: A Case in the Making of Gender Relations," 《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中国の伝統社會と家族》。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 65-93。
- Ko, Dorothy. "Between the Boudoir and the Global Market: Shen Shou and Suzhou Embroider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Gail Hershatter,

-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Mann, Susan. "Fuxue (Women's Learning) by Zhang Xuecheng (1738-1801): China's First History of Women's Culture," *Late Imperial China* 13:1, 1992, pp. 40-62.
- Overmyer, Daniel. "Values in Chinese Sectarian Literature: Ming and Ch'ing Pao-chuan,"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and Evelyn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Robertson, Maureen. "Voicing the Feminine: Constructions of the Gendered Subject in Lyric Poetry by Women of Medieval and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3:1, 1992.
- Robertson, Maureen. "Changing the Subject: 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 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71-220.
- Widmer, Ellen. "The Epistolary World of Female Talent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0:2, 1989, pp. 1-43.
- Widmer, Ellen. "Ming Loyalism and the Woman's Voice in Fiction after *Hong lou meng*," 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66-396.
- Widmer, Ellen. "The Rhetoric of Retrospection: May Fourth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Ming-Qing Woman Writer," in Dolezelova-Welingerova and Oldrich Kra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 193-225.
- Widmer, Ellen. "Honglou meng ying and Three 'Women's Novels' of Late Qing," 收入羅久蓉、呂妙芬編，《無聲之聲 (II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文化 (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301-326。
- Widmer, Ellen. "Honglou meng Sequels and Their Female Read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Martin Huang ed., *Snakes' Legs: Sequels, Continuations, Rewritings, and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Literary Experience and Body Politics: Directions in the Studies of Women's Literature of the Qing

Siao-chen Hu

Abstract

This essay focuses on women's literature from seventeenth-century to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urveying and analyzing research directions of the past decade and new approaches that will possibly rise in the future. I point out that the concept of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serves as the background for nearly all scholarly work on women's literature,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writing and the idea of "canonicity" is significant. Starting from this understanding, I survey the collections and compilations of women's writing from the Qing period, and discuss several modern histories of women's literature. I further introduc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idea of canonicity in recent studies. Next, I raise major topics in the studies of women's literature, including literary activity, literary controversy, studies of individual authors, studies of particular genres, etc. I also propose that we pay more attention to literary women and their activities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last section I list some new approaches that may arise. These include women's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women's literature and area culture, women and publishing, and women and literary/artistic activities other than writing. To conclude, I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returning to the text and its aesthetic value in the studies of women's literature.

Key Words: women's literature, literary history, canon